



臺灣高等教育

發展的方向

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充實完滿的人格，
使能從容面對人生的各種挑戰，開展人生的使命，
或者說有意義的活下去。

孫震◎著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臺灣高等教育

發展的

方向

1999年1月

國立出版社

孫震教授的教育經濟觀

孫震教授是受國內學術界非常敬重的經濟學者，雖然自民國六十二年他以「青年才俊」受到當時行政院長經國先生的知遇延攬，出任經設會副主委走上公職路，他跟學術界的關係始終非常密切，論著發表未斷，並經常應邀在國際會議及國內學術研討會演講，無減「讀書人」的本色。相識三十年來忝列老友，筆者不僅有機會細聆謙論，也受到他思想上的啟迪與治學態度的影響，追隨他以「書生」自許。只是伯東兄文筆行雲流水，引經據典，自成灑脫的風格，跟他「溫良恭謙讓」的君子性格完全襯合。他在傳統國學上根基深厚，博覽強記，在講演中詩詞古文琅琅上口，讓同輩學者心儀不已，筆者也是羨慕者之一。這次新書出版，因係以教育經濟學為主題，所以很榮幸能先讀為快，忍不住動筆補綴數行，藉表推崇之意。

九十四年底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頒贈唯一的「教育學術卓越貢獻獎」給孫震教授。這個教育專業界的最高榮譽對於榮銜無數的伯東兄來說，雖然不算什麼；但是在評審過程中難免有極少數評審委員以獲獎人是經濟學者而非教育學者，一度持有稍微偏狹的看法，後來還是對孫教授在教育上的卓越貢獻有了共識。事實上，孫教授曾主持國立臺

灣大學校政將近九載，長年未曾離開課堂講席，作育英才難以計數；他經常對高等教育與革發表精闢看法，並曾促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成立，無論在道德文章或實務貢獻，確確實實是一位教育家。孫教授最近一年來應邀所作八、九場講演，勾勒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以倫理導向的人文思想為主軸，檢視當前國內一些教育問題，尤能顯示孫教授的教育經濟觀跟多數經濟學者的純功利主義思想，在知識境界與學術視野上頗有不同，譽為富有人文氣息的經濟思想家，當之無愧。

孫教授在本書中一再指出，人生追求的價值可分為經濟價值（追求所得與財富）、社會價值（追求地位與名聲）、精神價值（指心靈上的獨立與自由）與倫理價值（因同情與關懷而產生）。他中肯地批評當前「教育知識化、知識工具化」的弊病，因為完全「忽略了對人生精神價值的陶冶」，「精神價值是指不假外求、自由自在的一份獨立心靈。精神價值最重要的社會意義在於為我們忙碌緊張的競逐人生開闢一處心靈的桃花源，讓我們可以優遊其中，做自己的主人。」他也不止一次提到：「我國傳統教育理念重視倫理勝於知識，重視行為勝於言辭；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是知識，行是行為，忠和信是品德。」他且直率地指出：「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最大的缺失應是完全忽略了倫理教育的重要性，尤其

總諮議報告書中，對倫理教育或品德教育竟然隻字未提。」

孫教授對當前中小學教育的困境也分享很多教育專業同仁的看法：「學校教育的困境主要在於激烈的升學競爭引導教育的方向，扭曲教育的內容，以致形式上雖以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為理想，但實質上獨尊智育，少有餘力兼顧其他四育，則是較常看到的現象。」

本書中對於目前國內高等教育一些見仁見智的熱門論題，孫教授從教育經濟學的立場分別有所剖析，並有相當具體的見解。茲舉近年大學院校急速增加及教育部對各級學校學費採取限制政策兩項為例，可以看出孫教授自由主義經濟學者較樂觀的看法。

「近年來臺灣的大學增加太快，大學太多，而出生率下降，很多人擔心不久會有大學招不到學生。其實這不一定是壞事。在產業界，效率低的企業會賠錢、倒閉；在教育界，品質低的大學為什麼該留下來繼續誤人子弟？」「教改會為什麼主張增加高等教育的供應？主要的理念有二：（一）大學教育是人生求真求善求美的重要歷程，大學幫助我們得到知識……。 （二）追求大學教育是人民的權利，不應以制度加以阻撓……。」「大學的制度應改變，使各種年齡的學生都有方便的管道進大學，或者重進大學、讀學位、讀學程，或只讀一門喜歡的課程。」最後一段話呈現的正是今後發展終身學習體制的教育遠景。

關於學費政策，孫教授是主張政府不限制收費標準的自由開放政策。「其實政府不必擔心大學濫漲學費。因為競爭之下，學費偏高的大學會自食惡果，被自己的收費政策逐出教育市場。」他且指出：「臺灣為了提昇大學水準，追求卓越，躋身亞洲大學領先地位，進而追趕世界名校；在看不出政府有能力發展經濟，改善財政狀況的情勢下，將來大學提高學費可能是難以避免的選擇。我一向主張政府不給錢就少管制；自己不出錢或出很少的錢，卻不准大學調整學費，只有一個可能結果，就是看著大學教育的品質日愈相對於別的國家低落。」

孫教授在他其他專著中也常有教育的論述，例如民國九十年出版的《臺灣發展知識經濟之路》一書就包括六篇論文，包括〈如何培育下世紀的建設人才〉、〈臺灣跨世紀教育發展的願景〉、〈二十一世紀青年教育的方向〉、〈教育的社會功能與個人功能〉、〈教育資源的分配與社會公平〉、〈社會有效運作的倫理基礎〉等，可見孫教授平常對教育發展的方向一直非常關注。孫教授的教育思想一向以倫理為終極價值，他在元智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時開設「企業倫理」課程，並在《經濟日報》撰寫社會倫理的專欄短文；他也曾協同李國鼎先生推動富而好禮社會的「群我倫理」（第六倫）運動，可說是道理一貫、言行一致的倫理布

道家，無論從他的講演，或是他的待人處世，都不難隱約看到社會倫理的影子。值茲今日社會紀律廢弛，道德意識頹落，多讀孫教授的文章，可以砥礪向善意志，激發道德情操；當然孫教授在學術造詣上的深厚格局，在他論述中也一樣表露無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名譽教授

鄭盛福

謹誌

二〇〇七年七月

孫教授的淑世主義教育觀

臺灣的高等教育何去何從？簡單的說就是：「好還要更好。」否則，就會停滯或墜落。

本來教育的本質就是「求好」，不好的要變好，好的還要更好 (betterment)。這是一種細部規劃漸進改革的過程，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躍進。教育如此，高等教育亦應如是，不然的話，就容易流為「反教育」。還有，任何改善的過程應該遵循兩個基本原則：合理近情與實踐可行 (reasonableness and practicability)。尤其是任何教育理論，如果違情悖理，不食人間煙火，這種烏托邦的空想，哪有實踐應用的可行性？

最近本人有幸拜讀孫震教授（習慣上我稱呼他孫校長）有關論述臺灣高等教育的十二篇大作，深感其文理密察，且既理性又感性，實踐可行性頗高。基本上孫教授認為教育應追求真善美，兼顧利己與利他的慾望，整合發展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精神價值與倫理價值，這才是「共同形成我們的幸福函數」。也就是說，人不能受制於名韁（社會）利鎖（經濟），應進一步陶冶其悠閒自適（精神）與慈悲淑世（倫理）之價值。否則，「倉廩實而不知禮節；衣食足而不知榮辱。」這樣的社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社會嗎？

臺灣地狹人稠，天然資源不甚豐富，生活壓力特別重，再加上我國傳統文化習俗特別重視子女教育，馴至升學與就業競爭劇烈無比，扭曲教育的目的、政策、內容、方法：等等之正常規劃與營運。所以，在臺灣辦教育與從事教育改革，千頭萬緒，怎麼改都不夠徹底，怎麼改都有缺失，都有人不滿意，因為只做皮相的枝節外科手術，而無法回胎重育，撼動或緩和非教育本身之外在大環境大傳統的龐大壓力，則「過度競爭」(over-competition)之惟知主義的升學競爭壓力，不會因為任何一次的皮相教改而消失。也因為如此，教育才更要不斷改革，但是，不要忘記孫教授曾殷殷提醒我們：「教育問題不能單獨在教育中解決。」

抱怨歸抱怨，我們既生息在這個臺灣寶島，卻無暇悲觀，也不可做膚淺的樂觀，而要力行積極的淑世觀，有一分努力就有一分希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慈悲、淑世，這是我所體認的孫教授之淑世主義教育觀。臺灣人口眾多（庶矣），也差不多能衣食溫飽（富矣），「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後教總比家徒四壁、餓莩盈野，容易教化萬民，效果較佳。這是孔子的理念，《管子·牧民》也有這樣的想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孫教授早年襄贊國家經濟建設大政，參與發展國家經濟與教育，無非要庶民能衣食溫飽；而他嗣後又孜孜矻矻掌理臺灣大學校政，大力拓展校務；並參與全國教

育改革規劃，掌理大學考試中心，熱心全國教育改革。目前仍退而不休，勤於著述，講學上庠，宣揚其人文博雅的經濟學及高等教育理念，尤其非常熱衷於高等教育理論與實際的研究，比之教育學科班出身學者，並不遜色，真是難得！凡此種種對文教之長期貢獻，大家都有目共睹。恰好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約三十個團體參加），於二〇〇五年底設置「教育卓越成就獎」，孫教授由本地中國教育學會與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聯合推薦參與遴選，經初審、複審及決審，得票最高而獲獎。根據該獎項辦法，得獎者在一年內要做六次有關教育學術或實務的專題演講。這些演講活動，孫教授大致已完成，真是衷心的感謝他！

本人因擔任該聯合年會主席，在孫教授十二篇大作集結付印之前夕，有幸先睹為快。孫教授對我國高等教育之目的、政策、學制、課程設計等，確實有其合情理與可行性的獨特見解，可供教育行政主管、高等教育界、或一般讀者之參考應用，深盼我國高等教育之發展能蒸蒸日上，在此藉用孫教授的話：「好還要更好！」是以樂為推薦。

文化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歐陽教

謹誌

二〇〇七年七月

為實現幸福而教育：孫校長的教育理念

孫伯東先生不僅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在其波瀾萬丈的公務生涯中，更是跨越了眾多的重要領域。但是對於臺大人而言，他卻是第一位本校畢業的臺大校長；以他特有溫柔敦厚卻又理性堅持的情懷，穩健的帶領臺大走過了艱難前後的動盪歲月；不但逐步的完成了臺大校內的民主改革，也間接促進了社會、國家的民主發展，確實實現了他對臺大校訓的特別體會：「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我們今天念這八個字會不會感到像《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伯東先生在擔任經建會副主委兼發言人時經常回答外國訪客，對臺灣經濟發展成功的主要因素，總是強調：「教育」。不論就專業或就參與而言，他都該是對一九六四年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成立「人力資源小組」，提出的「人力發展計畫」，依據經濟發展目標，預估未來人力供需，作教育部各級教育發展之規劃；以至一九六八年發展九年國教，進而將高中、職學生比例調整為三七七等等措施的成就與貢獻，知之甚詳。但伯東先生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參與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高等教育組時，已在他出任臺大校長長達九年任滿之後，因而視域格外恢宏，思慮更見周詳，對於「教育」的看法就遠遠超出經濟發展與人

力規劃，而回歸到受教育者的能力培養、人格發展與生活幸福上來。

當我們以接受教育者為教育思想中的教育「主體」，而非社會經營所要處理的教育活動之「客體」時，則教育不僅是社會人力的開發與「投資」；更可以是國民追求其實現生命意義與價值的過程與完成，因而以經濟的活動作為比喻，亦可以算是一種「消費」，而在其中得到生命的充實與精神的滿足。因而孫校長批評當前教育之弊病正在「教育知識化，知識工具化」，就格外擲地有聲。因為從經濟發展與人力規劃的角度看，這不但是無可厚非，甚至是有理有必至，勢有必然的需要；只有站在受教育者追求生命意義，實現幸福生活的角度看，這種「知識化」「工具化」的現象，才凸顯了它的嚴重不足。

因為孫校長所體認的已經是：

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充實完滿的人格，使能從容面對人生的各種挑戰，開展人生的使命，或者說有意義的活下去。其中應包含生存發展的能力和道德或倫理的品格。

也就是在「追求物質欲望的滿足，以維護健康與成長，過安適的生活；並建立社會地位和聲望，受人尊敬」的「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之外；尚包括有「追求精神滿足的動機，

讓人生可以擺脫社會的枷鎖，尋求精神或心靈歸宿」的「精神價值」以及「公平」、「仁慈」之「義」與「仁」等的「倫理價值」，並且由此四種價值共同構成的人生價值體系之開展與實現。

因而一方面確認：「大學教育是人生求真、求善、求美的重要歷程」；另一方面則主張：「追求大學教育是人民的權利」，「不應以制度加以阻撓」，在教改的建言中「主張『鬆綁』對大學的限制，讓社會供需自行調整」，也就是主張擴充大學教育，使高等教育普及化，放寬入學制度，並應對中年與高齡人口開放，成為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基礎。這些主張的背後，實在涵蘊著孫校長領導臺大期間艱辛爭取「大學自主」的長久經驗與淬礪而出的高遠智慧。他所謂的「鬆綁」，意蘊深遠，他一方面強調：「制度應求變通，與人方便；不應僵化，與人不便，也造成自己的困難」；一方面則主張：「一種組織當其面臨威脅時就會自求改變，故政府如無力幫助，就應少加干涉」。其中僅就「經費」一項，他即明白指出：

我一向主張政府不應干預學費。一方面不給錢或只給一部份錢；一方面不准學校調高學費，更是不合理的干預。這樣干預只有一個結果，就是高等教育的品質惡化。

其實政府不必擔心大學提高學費，因為大學之間要競爭，個別大學調高幅度太大會使學生流失，威脅到學校的生存。政府如給大學更多自主空間，容許大學自由調整收費，若干年之後，臺灣就會出現高品質、高學費的大學，也會有低品質、低學費的大學，對社會各有不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貢獻。

孫校長一方面秉持自由經濟的信念，信賴公平競爭之市場機制的那隻隱形的手；一方面則是深具多元價值，開放社會的理念，既相信：「競爭是必要的，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亦堅持：「社會要多元，要平等，人不需要追求單一的目標」，因而主張：「隨了大學增加，大學的類型應分化以發揮不同的功能，滿足學生不同的需要，也為社會提供不同的人才。我們不能以單一的學術表現比高低。」

這些論述關懷的已不僅止於「教育」，其中自有孫校長「邁向富而好禮的社會」之願景在，所以主張「優游於世俗功利之內」；強調不僅要「追求財富」更要「追求幸福」，注重倫理與精神的價值：

我們應從小時候就培育廣泛的知識和多方面的興趣，不使知識只成為達成世俗目標的手段；知識更是我們直接消費享受的目的。我們服務社會，但是作自己

的主人。我們優游於世俗制度之內。國家的教育體制應幫助每一個人實現此一理想。畢竟社會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才更值得我們尊重和維護。

「我們服務社會，但是作自己的主人」，真是一語中的的點出了作為「自由人」的精義。但孫校長始終不是懸空的講「倫理」、講「精神」，而總是落實到社會制度上：

其實孟子也只說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仁、義、禮智的開端而已。尚有待社會的澆灌培育，才能成長茁壯，使倫理充分發揮和諧人際關係、幫助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的功能。這固然有賴社會上多種制度的配合，例如我常常鼓吹的：廉能的政府、清明的司法和知恥的文化；但教育無異是其最重要的一環。

寥寥數語，貌似信筆拈來，其中自有對於社會各種體制之宏觀與透視，既凸顯了教育與教育制度的重要；也反映了體制之間的環環相扣。孫校長所透顯的關懷，即使從教育契入，但其眼光之超卓遠大，亦於此可見一斑了。

伯東先生卸下臺大校長職務後，仍與臺大關係密切，目前除了榮膺本校名譽教授，並擔任校友總會會長，繼續關注臺大發展，襄贊各種相關事務，貢獻不斷，一直是臺大人所敬重的「孫校長」。孫校長長年為臺灣高等教育發展的苦心籌謀，貢獻付出，終於充分得到教育專家們的認知與肯定，因而獲頒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會九十四年度「教育卓越成就獎」，臺大與有榮焉。

高等教育的方向與成敗，在這全球競爭的時代，尤其攸關國家的發展、社會的福祉與文明的進化，孫校長多年來身歷其境的參與擘畫、高瞻遠矚，經由獲獎後，在依規定所作的多場專題演講中，一一披露，充滿老成謀國的志意與智慧，不僅指引當前，亦更深慮未來，足資國人與當政的長久參考。現在將演講稿集結成書，交由臺大出版，則更有將其多年心血之睿智宏圖，託付臺大而流傳遠佈之意，這不但出於孫校長多年的厚愛，亦更是臺大的長久榮幸。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李嗣諤

謹誌

二〇〇七年七月

自序——教育問題不能以單一方程式求解

民國九十四年冬，我經中國教育學會和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推薦，獲頒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九十四年度「教育卓越成就獎」，並應邀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大會中作專題演講，真是我意想不到的殊榮。我雖然直到晚近退休之前都在教育界工作，即今在借調政府服務期間也仍然授課，而且未曾荒廢研究和著述，但和很多畢生獻身杏壇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界同道相比，畢竟不是全神貫注，因而感到十分慚愧。尤其我的專業是經濟學，經濟學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世俗功利之學，教育則為超越功利的神聖使命，獲頒此獎更讓我有特別知遇之感。我對推薦我為候選人和評審委員會諸君子的開闊胸懷十分敬佩。

根據「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教育卓越成就獎設置辦法」的規定，得獎人須配合聯合年會秘書處或贊助單位的安排，在一年內進行六次以教育學術或實務為主題的專題演講，其中一次必須在當年度大會發表；專題講演並應附完整講稿。過去一年我有機會在不同大學作多次演講，並完成十篇稿件，加上兩篇相關的舊作，共得十二篇。雖然尚有一些未盡之意，但大致已經表達了我對當前臺灣高教發展的一些重要看法。我希望未曾辜負教育學術界給我此獎的雅意。